



唐诗的丰碑：《九家集注杜诗》

□ 陈广忠

杜甫（712—770）是唐代著名诗人。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调张籍》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杜甫，分别代表了唐代诗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杜诗流行1200多年来，许多篇章，百姓耳熟能详，已经深深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九家集注杜诗》，是目前传世最早的宋代版本，为南宋郭知达编辑，收诗1431首。本书工作底本，采用清代《四库全书》影抄宋本，乾隆皇帝亲自赋诗二首，特别推崇和珍视。本书历时10年，选用多种宋本，精心对校；用诗韵断句，新意迭出；辨证失误，考证谨严。书名虽为“九家”，实收南宋之前61家的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著作大多已经失传，皆赖是书得以保存，益显是书之珍贵。

爱国忧民 矢志不渝

杜甫44岁时，安史之乱爆发。持续近8年的叛乱，使唐朝逐步走向衰落。此后的15年间，杜甫在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中，艰难地走完了一生。但是他的爱国忧民的情结，始终没有改变过。

杜甫对安史之乱给以深深地谴责。他在陷落的长安，写下《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当时天下最雄伟壮丽的大都市，沦入敌手，一个“破”字，看到的是破壁残垣，荒草丛生；昔日辉煌，荡然无存。他在《北征》中途经战场，亲笔写下“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可知这场战争是多么的惨烈！作为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他的祈盼是：“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杜甫的目光，注视着战争中的苦难百姓，48岁之时，写下了著名的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新安吏抓丁，“青山犹哭声”。石壕吏“捉人”，“老妪”愿充军。“子孙”阵亡，百家“空巷”。战争的残酷，人民的受难，作者痛彻心脾。

对于取得平叛胜利，杜甫高兴得发“狂”。“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

泣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悲喜交集，噩梦结束，可以回乡了。

杜甫观察问题，判断准确，分析透彻。就在大叛乱前夕，杜甫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巨大的贫富差距、鲜明的阶级对立，表达得精准而传神。而今诗人无比悲痛的是，44岁时前往奉先看望妻儿，“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天折”。幼子没有吃的，刚刚才饿死。作为官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家，早已饿殍遍地。

杜甫的可敬可佩，就在于：虽然穷困潦倒，但常怀“忧民”之心。杜甫49岁，托亲靠友，在成都浣花溪建了草堂，有了栖身之所。但是，狂风、暴雨，卷走茅草，“雨脚如麻”，无法栖身，彻夜难眠。而他想到的却是“天下寒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人关心人民疾苦，实为千年师表。

律诗精品 千古传诵

杜甫是律诗高手，创作了1000多首律诗，实现了格律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其中的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绝、七绝，很多成为“绝唱”。杜诗的格律运用，如平仄、粘对、拗救、对仗、用韵、字句有定等，莫不得心应手。《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中说：“晚节渐于诗律细。”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对律诗的规范和新体的创作，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

比如，明朝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五把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本诗作于杜甫暮年56岁时。时，“第一”体现在：从格律上说，粘对严谨，没有失粘、失对现象。全诗四联对仗，极为罕见。词性、类别相同，以工对见长。首句入韵，为七律正格；从内容上说，“悲秋”之“悲”、“多病”之“病”，写出作者老病漂泊的痛苦。“无边落木”，

虽饱含悲凉；“滚滚长江”，又不失豪气；从修辞上说，运用比兴、象征、对偶、夸张等多种手法，达到情景交融、炉火纯青的境界。

杜甫还对律诗进行了创新，一种新的诗体——“吴体”应运而生。《九家集注杜诗》标注的“吴体”有四首，即《愁》《释闷》《寄岑嘉州》《晓发公安数月憩息此县》。“吴体”诗是一种平仄相对自由，即允许失粘、失对存在的律诗，并不需要补救。“吴体”诗来源于吴地“俚俗”之诗，杜甫推而广之。北宋晚期赵次公尚能准确辨析，清代学者仇兆鳌、黄生已不能正确解读。

对于杜诗中的新创“拗体”，代表作是《白帝城最高楼》。通过对格律中的平仄、失粘（3字）、失对（7字）、大拗（1次）、孤平拗救（2次）等进行分析，可以知道：全诗用平声韵，首句入韵，属平声尤、侯合韵。颌联、颈联对仗，主要是工对。有拗有救，合乎规定。所以，这是一首标准的“拗体”七律。

励志为文 雨润学坛

杜甫博览群书，才思敏捷；勤奋好学，善于创新，在唐代诗人、学者中极为罕见。

杜甫家学渊源深厚，不仅“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而且对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天文历法、文字音韵、地理名物等，也多有涉猎。他走出书斋，万里游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乃是杜甫读书、写作真实生活的写照。

比如，杜甫对古代道家、道教文献极为熟悉，“集注”中引用《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多次。除此之外，杜诗还记载了鵬冠子、华盖君、元逸人、李白、魏夫人、葛洪等众多人物的事迹，充分显示了杜甫对道家、道教作过精深的研究。

“多师”求教，成就了杜甫。杜诗中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李白、杜甫，诗坛双星。李白，年长杜甫11岁，是前辈、老师、偶像、朋友。李、杜曾在洛阳、兖州二次见面。杜甫专为李白写了8首诗，9

去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第二，充分借助中国当代实践和历史经验的深厚资源。人类的心理认同从根本上说来自实践的凝聚，既来自前人传承的历史经验，更来自自己亲身参与的现实实践。当代青少年的政治认同无疑紧密关联着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同时也和漫长的民族历史演化过程的经验积淀有关。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鲜活的材料呈现给青少年，既让他们看到其中不容置疑的深广客观事实，也让他们看到其中清晰明确的政治演进逻辑；既让他们看到这条道路取得的巨大成果，也让他们看到这些成果指示的未来前进方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把中国近代屈辱探索的过程深深地告诉他们，让他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几代中国人艰难追寻的历史成果。只有借助现实实践和历史实践的深厚资源，广大青少年的政治认同才能指向正确的方向，才能坚韧长久。

第三，充分发挥课程和教师的作用。对于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培育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最为主要的培养环节和程序，思政课教师是最为主要的传授者和引导者。当前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培育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改革创新课程体系，提升教师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水平。关于课程，在充分继承长期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有必要从内容到形式、从课内到课外、从教材内容到教学方法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创新。其中，非常关键的是“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原则和系统性、全面性的原则。前者要求在课程创新中要引入广阔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富有时代特色的语言体系，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处写到李白。如“白也诗无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一斗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在《春日忆李白》中写道：“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希望再次同李白相聚，再详细切磋诗歌创作。可知杜诗取得的成就，与“多师”关系密切，其中就汲取了李白的诗作精华。

诗歌创作，传之“千古”，要为世代留下最好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杜甫严谨的创作态度。《偶题》写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继承曹丕的观点：“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及“三立”的要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就是说，“文章”“立言”，要慎之又慎，成为治世、为文的借鉴和典范。明代王嗣爽《杜臆》说：“此公一生精力用之文章，始成一部《杜诗》。”

杜诗写作，重在创新。古代诗歌创作，从《诗经》到盛唐，代有佳作。如何异军突起，再领风骚？杜甫描述创作体会时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僻”，孤僻、古怪。“耽”，嗜爱，喜好。这是作者自嘲进入忘我的写作状态。“佳句”，就是创新。一部“集注”，名篇辈出，妙句连连。

比如，杜甫创作了大量的长篇古体诗、排律。杜诗中20韵的有11篇；30韵的有7篇；40韵的有3篇；50韵的有1篇；100韵的有1篇。而读者熟悉的《北征》，140句，70韵，全部押入声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100句，50韵，亦为入声韵。众多创新的长篇诗作，其语言之优美、韵律之和谐、史料之丰富、思想之纯正，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难以超越的。

历史文化典籍

在今天的政治课程中，思想知识的崭新丰富和政治方向的准确坚定，二者缺一不可且应该互相协调、互相渗透、互相支撑。后者要求统筹推进思政课程内容建设及与其他课程的协同关系。《意见》提出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要求，这是对教师素养提出的全面标准，这些要求涉及人的知情意多个精神层面，同时《意见》还详细设计了加强思政课程教师队伍建设的程序和实施方案。

第四，实行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这说明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培育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一方面，《意见》提出：“深度挖掘高校各学科门类专业课程和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体育、艺术等所有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是课程体系的配合问题。另一方面，在教书育人之外还要形成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的长效机制，把政治认同教育融入青少年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整合各种教育措施和机制，形成高效优化的政治教育系统工程。

教育评论

修身，就是修德，指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和人格上的自我完善。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老百姓，都要把修身作为为人处世的基础与根本。修身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其内涵是通过陶冶、锻炼自身的道德品质不断完善自我、实现理想人格，进而影响他人、奉献社会。

修身能够抑恶彰善、濯污扬清，成就道德高尚之人。古人对人性的认识，说法不一。孔子曰“性相近”，孟子倡“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秦汉以后，董仲舒、扬雄等人则认为性兼善恶。不管怎么样，人性只是一个内在的、潜藏的某种可能性，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须下一番结结实实的修身功夫。孔子认为每一个个体后天所生长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对其成长至关重要，即所谓“习相远也”，《尚书·太甲上》曰“习与性成”，也是此意。孟子认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情感，但这四种道德情感只是“善端”，即善的萌芽，能不能显露出来且成长壮大，有待于后天的努力，需要自我修养、爱护、培养。就像树苗需要阳光照耀、雨露滋润，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斧斤砍伐、牛羊啃食，再好的树苗也会夭折。他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疾恶、有耳目之欲，故必须制定礼仪法则和制度规范，强制人们遵守。董仲舒认为人性兼善恶，善须后天着力培育才能成就。他举例说：“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即是说，虽然善是一种先天的禀赋，若不加以修炼，也可能成恶。总之，自先秦以来，思想家们不管对人性的认识如何，但都强调后天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唯有修身才能抑恶扬善，成就世间最高贵的人。

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礼记·大学》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是“齐家”的基础，因为一个人首先处于家庭关系之中，是家庭中的一员，他或是为人父或是为人子或是为人夫，那么修身之后，可以为一家表率，家庭便自然而然地会治理好。“齐家”是“治国”的前提，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是一个小社会，家庭和睦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和和美美、其乐融融，那么就会国家太平、天下太平。孟子把这一过程说得更为直接：“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朱熹注曰：“身正，则家齐、国治而天下平。”这说明了一个道理，要想使家齐、国治、天下统一，个人必须拥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与品行情操，这是治国安邦的基础。

修身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更好地发挥示范群体的表率作用。儒家文化特别重视执政者的道德修养，认为他们具有强大的示范带头作用。有人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对“政”的最佳诠释。正人先正己，执政者自身端正，才可要求百姓端正。要想使执政理念迅速实施，最好的办法是以身作则，自我修养，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因为为政者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具有广泛的带动作用与示范效应，他的一言一行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一种风尚、一种榜样，民众不知不觉在模仿学习。如果为政者正直无私、清正廉洁，那么上行下效，民众自然就走正道，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如果为政者胡作非为、营私舞弊，那么他在民众眼里就威信扫地，指令也得不到贯彻，即所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说，要想正别人，须先正自己：“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曾以伯夷、柳下惠为例说明圣贤之士对整个社会风气的良好影响带动作用：“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孟子还强调应把道德修养高的人置于领导地位，他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道德高尚之人适宜居高位、担重责，因为其地位高，大家仰望之，其所作所为会产生广泛的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反之，如果居高位者道德堕落、品行邪恶，就极易把恶劣的影响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产生不良后果。《孟子·告子下》记：鲁国打算任用一个叫乐正子的人治理国政，孟子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得夜不能寐。朋友公孙丑问孟子乐正子是否很坚强？孟子说不；公孙丑问是不是乐正子非常聪明有主意？孟子回答不；公孙丑又问是不是乐正子见多识广？孟子的回答依然否，但他接着道出自己高兴的原因：“其为人也好善。”可见孟子认为



儒家何以重修身

□ 张文珍



为政者有“好善”的品德胜过足智多谋与精明强干。为什么“好善”如此重要呢？孟子说：“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訾訾，予既已知之矣。’訾訾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意谓，一个道德修养高的当政者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能把良善正直之士吸引过来，大家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就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

培育青少年坚定的政治认同

□ 刘东超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当代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多元激荡的思想条件下，培养青少年正确坚定的政治认同至关重要。为此，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许多具体而明确的设计和措施。

第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方面在教育工作的组织管理中，要深入地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使这些原则通过身边制度的落实自然而然地渗透进青少年的头脑。另一方面在教育内容的选取编排中必须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展开，尤其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体内容安排进教学。为此《意见》提出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课程群建设，全面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让青少年通过全面系统的学习，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为实现这一目标，在不同的教学阶段应该安排不同的教学重点。在小学阶段，重在培育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在初中阶段，重在打牢他们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强化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意识。在高中阶段，重在提升他们持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素养，形成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认同。在大学阶段，重在增强他们肩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担当，引导他们坚定地